

# 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社会学：对绝境的解释

〔英〕戴维·布什

经历了十多年的蓬勃发展之后，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新”发展社会学似乎陷入了绝境。过去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现在却在理论上遭到了以前追随者的猛烈评击。随着有关经验研究的日见贫乏与陈旧，似有希望的基本概念讨论也得不出结论。同时，还有大量的领域有待研究、有待理论探讨；而在现有的领域，即使是研究最集中的部分也缺乏一门健康的社会学学科应有的积累性质量。

不过，人们除了觉得有问题之外，几乎不清楚新发展社会学的各种缺陷之间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一方面有许多人分析有关第三世界发展的错误假设和某些激进理论的方法论（其中大多数分析暗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严肃之处的潜在优势），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愿意探索目前的绝境与激进社会理论遗产中比较普遍却又不那么容易驾驭的难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本文希望通过对一些熟悉的问题的分析来讨论这些关系。

## 依附论与发展社会学：十五年后

依附论曾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现在却已消逝，尽管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相信，所谓“被广泛接受”是指依附论的这样一个观点曾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研究工作产生过影响，即：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社会结构与政治取决于其嵌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定特点，也就是说外部关系决定了国内结构特征，而不是相反。

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沃勒斯坦（I.Wallerstein）的观点以及山克尔（O.Sunkel）、卡多索（F.H.Cardoso）和魁加诺（A.Quijano）的部分观点多少年来从各个角度已遭到了猛烈的冲击。现在看来，激进发展理论与其可能达到的境地相比，缺少积累性经验研究、过多无意义的争论，而且这种状况在发展理论中日见经常。可以认为，由于反复不定的循环推理和经验谬误以及演绎基础薄弱，依附论已失去了影响力。

弗兰克的主要理论命题是：“当代低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发达的卫星国与发达的宗主国之间从过去到现在的经济与其他方面关系史的产物。”就是说“如果也只有当卫星国与宗主国之间的纽带最大限度地削弱时，卫星国才会经历它们自己最伟大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古典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一些历史的与比较的事实支持了这一命题。问题是仅用历史事实而不举旁证，命题就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式的真理。在其假设和附设中，所谓“古典资本主义发展”只是意味着“自给”或“自治”以及工业的增长，因此在经验层次上就只是同义反复式的游戏。根据史密斯（S.Smith）和沃伦（B.Warren）的研究，阿明、多斯桑托斯（T.Dos Santos）和罗德尼（W.Rodney）等人的研究也有着同样的缺陷。

循环或同义反复地推理是依附论以及依附框架中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变体的核心。尽管许多拉美依附论者最初所涉及的是某些特殊的经济社会问题，即一方面注意不断恶化的收

入分配模式、社会“边际效应”和独裁政治，另一方面又注意跨国公司角色、不适宜的技术与/或文化异化；但其命题本身就体现了同义反复。因为很难说这些命题能在经验层次上得到证实，例如无法证实边际效应及相关过程是依附因素（如由于跨国资本导致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殖民化）所致。初期的依附论没有把跨国化本身的效应同当地社会政治关系的效应以及通行的经济政策体制的效应等进行系统的区分。不过，拉尔（S.Lall）和韦斯柯波夫（T.E.Weisskopf）有效地运用了比较分析，对依附结果与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特殊政策模式和制度体系的结果进行了区分。而马诺维兹（D.Marowitz）则认为，成功的“依附发展者”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使最贫穷者收入状况的恶化，一是其他；决定其趋势的是外在的不平等程度。

由此看来，在理论和经济两个层次上，依附论都不能自圆其说。大量事实说明，依附论和低度发展理论并没有严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依附论者喜欢要么做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要么对经济学观点全盘接受。

依附论者认为，世界贸易的参与导致了欠发达国家的长期贫困，即国家发展进步举步艰难的原因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但是包括拉美和东亚在内的后发国家，伴随替代进口工业化（ISI）的是社会不平等及支付平衡问题的不断加深，而不是问题的解决。研究表明，ISI政策是造成许多半工业化国家收入分配退步和外在脆弱（指依附）的充分原因。事实上，依附论者完全被极其一般的荒谬现象欺骗了，因为进一步的替代进口必然导致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入侵、外在脆弱和就业与收入分配退步的进一步加剧。各种事实表明，这些拉美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后来在非洲也出现了。

尽管严格的“依附论”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大相径庭，但是从列宁甚至从马克思以来，依附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通过把阿明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简单对立来批判依附论只会产生两种不幸的结果。第一，稍不注意就会使得批判所针对的只是拉美国家持“依附”观点的人，并会完全忽视与之酷似的概念如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或“国际价值准则”。第二，由于强调依附论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因此就很难把握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依附观点在广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具有如此长久的影响力。总之，批判家强调发掘依附论推理的缺陷，而不是努力去解释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缺陷，因此，在一般意义上也就无法指导我们避开这些缺陷。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打算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棘手问题，特别是它的元理论（metatheory）。

不管是因为理论讨论的局限性还是别的原因，依附论式的东西在激进发展理论中仍很流行。负责引导新发展社会学的刊物仍在继续刊登不断涌现的有关第三世界地区帝国主义/依附结果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它有效地掩盖了偶尔出现的反依附论观点。人们注意到，发展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主焦点，如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形成，仍然被依附论马克思主义的表面问题和图解趋势所左右。人们尚未注意到的是，由于与马克思式的国家理论的结合，依附观点广泛地影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研究包括充满改革意义的政治研究，甚至影响了许多地区在政治困惑中的抉择行为。

### 沃伦的挑战：长处与短处

沃伦最勇敢最彻底地批判了依附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尝试了识别依附论的政治用途并



进而部分解释了其在某些领域的魅力。他的主要观点是有关第三世界国家中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体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1. 与当代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反，经验事实说明，在许多低度发展国家成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是光明的……

2. 二战后的历史证明了，在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力是主要潮流。

3. 直接殖民主义象一个巨大的引擎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而不是阻碍或打击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4. 发展的障碍并非来自帝国主义与第三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因为第三世界的内部矛盾。

5. 总体上看，帝国主义国家政策及其与低度发展国家普遍经济联系的净效应实际上是有利于低度发展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

6. 在不断增长的经济互倚关系内部，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世界之间的“依附”绳索已经或正在明显地松弛。

沃伦的主要观点资料充分、论证翔实、并没有滥发议论，但把经济质量和发展效应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却有不妥。

第一，它忽视了战后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一般模式中可能存在的重要系统差异。事实上，战后各类低度发展国家的发展参差不齐，未来几十年的前景也会有重要差异，其中发展好的GNP增长率将在8~12%/年，而差的却会出现负增长。沃伦并非盲目的乐观也导致了人们对发展潜力和潜在原因探索的放松。

第二，它忽视了对特定国家政策和制度体系的分析。显然，第三世界的发展经历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固有的各种长、短处；同样，政府及其政策也有成功与失败之别。沃伦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很不愿意接受。

还有，它解释不了直接殖民主义及其后遗症，也解释不了“国家主义”以及国家间的问题。

沃伦对殖民主义作用的描述使得人们怀疑为什么要全面兴起独立运动；而当讨论非殖民化时，他又强调非殖民化的优点。这就是他一维思路的最终结果——语无伦次。对殖民主义的欣赏源于过份象抽过份偏重经济；而把资本主义发展看作是一个同一的过程又导致了对一些虽不普遍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很重要的方面包括从殖民发展政策到不同国家群体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忽视，如非洲农民的一无所有、强制性劳动、种族隔离等。

在国家问题上，沃伦的观点同样隐含着经济主义。除了偶尔不协调地期望后独立体制运用贸易权促进国家资本主义以外，沃伦极力反对国家主义以及国家自决权。此外，他的框架还或多或少甚至完全不能解释欠发达国家当代经历中许多有意思也很重要的方面。这就使得其框架完全缺乏社会科学的应用价值。

从上述简短的评述来看，依附论的隐退并没有导致沃伦学派或“古典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学”高潮的到来。遗憾的是，我们的发展社会学研究尚未步入后沃伦时代。就象以前对依附论的详述一样，对沃伦的详说也过于针对个人和其理论的短处，而没有把握其元理论体系，即为什么一定学术传统所产生的是一定形式的理论而不是其他。

## 生产方式论战：绝境中的绝境

穿越1970年代的简单化倾向以后，发展社会学转向了生产方式，“剥削方式”和雇佣劳动的讨论。拉克劳（E. Laclau）的《拉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依附论疑难后迈进的重要一步。拉克劳坚信，弗兰克早期研究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混淆了生产和交换的关系，即认为交换是生产的原因。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流通从属于生产过程的论述相悖，而且由此产生的低度发展理论无法解释世界现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他主张，区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只能依据生产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这样才能理解17世纪后“融合”了各种生产方式要素的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是“融合”，是因为商业资本的侵入重组而不是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

很显然，拉克劳希望在依附论与沃伦之间建立一种折衷观点，但却没有成功。因为根据他的分析，某时某地促进农业中前资本主义关系加强甚至复辟的资本主义扩张嗜好并不是因为当地劳动力供给动态和阶级斗争，而是因为宗主国资本向落后地区转出的需要，这就无法解释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资本转移的机制。也就是说，所谓植根于生产关系的理论实际上只是虚幻。

与拉克劳坚持生产主义观点相反，少数人则顽固坚持斯维兹1950年代的“流通主义”观点，阿拉维和巴拉基就特别注重边陲国家中资本主义角色的另一面以及马克思的另一些重要论述，如边陲资本主义的资本流通和劳动补充形式、马克思关于封建生产方式的论述。阿拉维强调，类似于“生产方式”的概念仅仅以随意归因于“结构”的关系体系为前提，忽视了整体性，而马克思却是从整体为基础的。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有机结合”，而且是“历史运动规律的定义整体”。巴拉基也认为，“除非这些规律本身得到确立，否则任何定义形式的生产关系特征都不可能确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是各种“剥削关系”而不是雇佣劳动；为什么马克思认为过渡性危机和一定的生产方式在任何地方都具有时限性。

不过，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去讨论作为第三世界社会形态固有特征的多种生产方式融合却又荒唐可笑。显然，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雇佣劳动的剥削形式是什么？第二，它们服从什么样的“运动规律”？对此，很多人至少在开始时使用了“殖民生产方式”概念。殖民生产方式是这样一种结构，它兼容了殖民时代边陲的生产关系而不是雇佣劳动和从整体上把握宗主经济认为具有合理性的“剥削形式”。由于“殖民生产方式”的使用，产生了一系列在概念上纠缠不清的问题，如宗主经济采用的是殖民生产方式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以及为什么说后殖民生产方式或新殖民生产方式是国家独立进步的结果；殖民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什么，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什么区别等等。

布伦勒不仅对早发世界不均衡发展史的流通主义解释给予了致命的打击，而且对马克思式的资本主义观点作了清晰的评注。他很好地解释了自由雇佣劳动资本竞争体系的出现与现代资本主义动态转变特点之间的关系，并用现代世界史进行了普遍验证。

布伦勒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没有涉及当代的、后独立的第三世界；对一旦进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以后的前景过于乐观，而且未作详细论证。因此，它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替代依附论和殖民生产方式论的综合理论，它也无法解释强调发展与低度发展外在的与贸易有关的



原因与强调内在社会关系、阶级斗争和权力体制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如果把低度发展归结于外在原因就部分地与直接殖民主义和其他强调国家地区间非经济关系的观点吻合了；如果把国内阶级结构看作是内在社会关系的分化，也就认同了这样的观点即殖民权力戏剧性地转换了殖民地社会经济集团关系，尽管用布伦勒的观点来看，殖民地商业不足以打破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布伦勒的讨论似乎不应只限对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应只限于历史的非贸易的特殊情况。

简言之，本节的讨论并不能给生产方式论战以满意的结论。事实上，论战明确了许多观点，尽管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范难以调和，而且没有一种观点能独立于依附论与沃伦主义之外。所有这些观点只不过是一个或多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变体，而且与生产方式概念并不矛盾。

### 农民和贫民：过渡、衔接、包容

这一部分我想联系经济研究来进一步讨论亚生产方式/剥削形式/雇佣劳动包容度。生产方式衔接及相关概念影响了两个主要的经验领域：一是着重于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想象的农业过渡不彻底性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农民企业的生存方式；一是为都市中非正式群体非传统小型经济活动的持续性提供解释的研究。

研究者仍通过对拉克劳，梅拉索克斯和雷（Rey）等人观点的综合，采用了相对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理论，提出了农民效应问题，即边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能力维持部分转换了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保证为其提供低于其再生产成本的劳动力；还有的研究认为，小型企业为资本家提供了低于其价值的产品。也就是说农民或非正式群体通过转出或价格因素受到了“剥削”。

这就产生了两种理论随意性。第一，就小型企业与资本家群体的交换而言，如何判断交换的非平等性？不平等交换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如果说从农业地区来的边际劳动力所得到的工资确实低于在资本家集团内或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成本价格，那就意味着与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形态内部的交换与代表这一社会形态未来的纯资本主义交换理想类型相悖，这就违背了某种历史观，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第二，如果说是产品而不是劳动力供给低于其价值，那么可以认为其原因是投入这类企业成员的“工资”的产出低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得到的产出。因此，强求一种代表比较进步历史形态的抽象不平等标准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除随意性以外，有关“剥削”的假设在逻辑上也不能满足其应有的解释力，既无法解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前或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持续性。

最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同类型企业特定行为的取舍是根据利益与风险期望、普遍的成本结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决定的。因此，任何这类的决择都不可能考虑到剥削问题。

由此看来，经验层次的生产方式衔接观点在理论上并没有任何新东西，对小型企业社会关系的关注产生了某些有积累意义的研究，但在激进发展论战中，作为有希望的替代理论的基础，其基本的理论构架似乎并不令人乐观。

## 激进政治经济学派尚未履行的诺言

如果说，过去的十五年都受到了占主导地位理论观点的影响，与生产方式论战所取得的成果相比，许多其他的领域收获甚微，包括同一时期内许多发展经济学的论题。

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些欠发达国家，对涉及“城市倾向”公共政策制定的复杂问题，除了经济学家外几乎没有人去研究。同样，对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署官员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的“增长再分配”（RWG）概念也保持沉默。人们注意到，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并没有参与一些严肃问题的讨论，其中包括世界银行直接影响的领域。

就RWG而言，社会政治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却来自比较守旧的经济学家们。也许社会学的发展研究只不过是制定和补充发展政策施加影响而已，或直接在发展中国家、或间接地通过多边机构和国家援助工作发生影响。

### 对绝境的解释

这里我们要从纯理论的分析转向元理论的思考。以弗兰克和沃伦为例，我们不仅要知道弗兰克与沃伦错了，而且要进一步分析为什么错了，是什么使得他们继续且坚持其错误。

我的基本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任务（即元理论任务）只是证明资本主义前夜社会上所发生的不仅可以解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必须的；而它对发展社会学的投入却超越了它可以使用的特定形式。同时由于发展社会学的各种观点分享了马克思主义元理论任务，而且各执一端，当然免不得长期论战。

马克思主义者信奉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的社会经济模式在发展理论中有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相信在理论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国家或国际经济政治和社会形态有关。第二种，系统目的论或功能主义。

亨迪斯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忽略了某些类型的问题，因为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相信，国家经济和社会形态的突出特点可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别是其“运动规律”中寻得。亨迪斯等反对生产方式概念，因为在整体意义上其结构就暗示了某种必然的结果；他们也对它表示异议，因为它“体现了本体论的特权，即某种秩序必要的普遍的第一权力”。

我的基本结论最有效地概括了沃伦观点的局限性：忽视了国家之间发展经历的系统差异性、进化论偏见和经济复古主义。所有这些都是非人为的扭曲或超越，其结果是只重视资本主义发展普遍、内在、主要的经济质量与效益。沃伦错在他“理论地忽视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特定结构，而且把它当作了普遍意义资本主义及其‘规律’的范例”。

史密斯认为，在所有的依附论者中，阿明是最努力地使用古典马克思主义语言的人，他紧跟列宁及其追随者，站在边陲的立场上力主“依附”在严格的意义上产生于帝国主义。阿明也错了，因为现实世界中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都不可能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中找到答案。

进而言之，依附论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样有着一种在同类中进行抽象分类的作用。拉尔认为，依附论所做的只是“挑选现代资本主义影响欠发达国家的特征进行‘依附’



归类。因此，在元理论的意义上它并没有摆脱沃伦式的或“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把各类国家经济的各种特点罗列起来，并相信它们是某些规律的方面或结果、或是资本主义尚未被认识的方面。

生产方式论战除了证明不可能用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分类法在依附论与沃伦之间进行架通以外，也抛下了大量的在概念意义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反映了企图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抽象普遍的“规律”来建立一组国家社会形态的角色理论或类似的替代框架的努力。遗憾的是，现实生活太丰富了，人们不可能用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来简单地把握。

依附论和衔接/包容论没有“运动规律”式的理论结构、没有以特定因果关系为特征的抽象命题体系及派生模式，有的只是对下述二者之一的坚持。一是对低度发展国家的发展问题以及社会结构与政治用它们嵌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特定（或静态或动态）特征来解释；二是相信因为在更广泛的体系中资本积累方式的差异，第三世界一定的社会经济过程坚持并采用了特定的形式。尽管这两种主张都已遭到了驳斥，但它们却仍然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为什么？

除了学术传统以外，我认为主要是由于系统目的论（功能主义）的某些形式在社会科学中所表现的魅力。因为依附与衔接分析常常因其功能式的分析而比一般因果分析能更彻底地解释第三世界现实。除了魅力以外，也许还由于研究者的阶级立场或洞察力，即某种特定满意度解释形式背后所潜藏的世界观。近几年中最重要的观点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多数命题是功能性的。不过，这一结论似乎有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地位。在社会学中，如果说功能性的主张是解释性的（即实际的而非理论的）那就错了。尽管社会秩序的存在可以用以解释为目的严格功能性陈述进行必要性假定，但是现在并没有证实、有很多理由相信将来也不一定能证实社会秩序中存在什么“反馈”机制。在元理论的意义上，结构功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都是非现实性的。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抹杀19世纪以来一般功能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而是说，功能式的理论往往表现出巨大的潜在解释力，理论建构中人们所想保留的也就是这种潜能，对依附论者来说，这就是魅力背后的东西。不过，如果真是象功能主义所解释的那样存在反馈机制，那么去揭示或解释欠发达国家制度对其母系统所作贡献变迁的特征就代表了一种不可抗拒的挑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依附论的批判变得半真半假，为什么如此多的理论论争最终以得不出结论而结束。

同样，在经验层次上的衔接/包容观点中，一般功能主义既是魅力的来源又是学术上迟钝的主要原因。急于证实小型企业发展实际模式的“必要性”是其长期存在的原因，在“流通”“生产”讨论把完全正当的理由让位于似乎离题的价值/价格观点，都是因为功能主义的魅力。也正因为为此，功能主义虚伪的自命不凡也造成了解释的陈旧和非积累性以及对一些较为紧迫的经验问题系统探讨的失败。

认识不到“政治经济学派”的前途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政治经济”的概念不是被用来发展有用的理论，而是被用来反对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全面合作。实际上，社会学家们借助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在发展研究中建立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的社会经济模式并没有跨越很多学科间的真正界线。事实上，真正接触经济学家所设想的实际生活是极端困难的。这就从另一侧面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学工作没有充分适应有关发展政策与实践更广泛论战的要求。

## 结 论

本文试图解释新发展社会学现实绝境的原因和特点。大多数的讨论都集中在人们熟悉的问题上，如依附理论的禅让，沃伦为“古典”替代理论的辩护、生产方式讨论以及现代发展社会学研究的冷热点。据此我认为绝境普遍存在，它是普遍性理论迷惑不同程度地影响激进发展论战所有主要观点的产物。

我认为，曾风行一时的依附论在逻辑、经验和理论各方面都受到了致命的批判。但是，部分因为激进理论在各方面都试图弱化这种打击，依附论并没有消亡，它仍然影响着这一领域的工作。作为反对依附论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沃伦式”的发展社会学有着系统缺陷：不能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动态和差异式扩散来充分把握今天第三世界发展所面临的复杂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尽管他用“古典马克思主义”作后盾。这些评论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这些理论局限性背后的东西直到现在也未能充分发掘。

这部分是因为在思想观念与人们仍然坚持认为，运用折衷于1970年代极端范式之间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研究会有光明的前途。但是，对生产方式争议的重新考察并没有证明任何这类中间立场的存在，也没有说明那些中心概念能始终如一地适应发展研究。方式/包容论产生了一些（某种积累层次上）针对农民和城市贫民的有益研究，但这不能归功于理论指导。同时研究中也疏漏了一些重要问题。尽管把有些问题托附给了政治经济学派，但新发展社会学又回避与经济学真正合作，而且没能对当代发展问题作出人们期望的解释。

我以为这些严重的问题是理论上的，而解释这些理论缺陷的长期存在以及不断新生则是元理论的任务。在新发展社会学明显的偏见、盲目和矛盾背后，有着一种元理论的信条，即在欠发达世界中，某些过程与结构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必须的。

这一信条有两个变体：一个是马克思式分析的必要类型，即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社会形态可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规律中找到“答案”；另一个也是受马克思理论激励的，即系统目的论或功能主义。这就是产生新发展社会学当代绝境的基本原因。如果我们将来希望做的好一点，它也是我们要清除掉的障碍。

(邱译奇编译自Marxist Sociology Revisited: Critical Assessment, Edited by Martin Shaw,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5)

责任编辑：苏国勋